Forum
上证论坛

在经济处于并不稳定的时期,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在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复杂局面下,将改善民生作为明年工作的核心环节,是把经济的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统筹考虑的结果。而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人群消费能力,把内需作为经济增长的拉动力量,正切中了要害。这让我们对明年以及未来的中国经济前景充满信心。

民生与增长两者并举解开头号宏观难题

王福重

在关键时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澄清了国内外对中国宏观政策走向的猜测和误会,将明年工作的主基调定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与改善民生两者并举。

2009年,借助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特别是靠着4万亿的刺激计划,经济增长速度逐月上升,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属表现上佳。但是,在经济回升的同时,CPI和PPI也跟随上涨,不出意外,11月CPI将回到正值,而沪深股市表现更是抢眼,股指翻了一番还多。有关资产价格上涨,将引起实体经济通胀的担心和议论,不绝于耳。

因此,对于明年的中国经济,宏观决策者的头号难题,就是确定在保持经济增长和防止通货膨胀之间,哪个为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明年要提高宏观调控水平,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实际上,是把保增长当作了第一位的任务。

无论是经济结构面临的深层次调整,还是就业的空前压力,都必须、也只能通过经济持续增长才能解决。至于通货膨胀,此前中央提出要管理好通胀预期,这已足够。如果把防控通胀放在更突出的位置,势必掣肘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核心目标。

就通胀发生的现实基础来说,也不宜把通胀看得过于严重。现在多数行业产能严重过剩,亟须压缩;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多已企稳,像去年那样的大幅度波动再次重演几率不大;而食品等在CPI中权重最大的商品,虽有短期的扰动,但是增加供应不会困难。更重要的是,居民收入增加比较缓慢。种种因素合起来,可以得出结论:包括CPI在内的商品价格指数的过度上涨缺乏依据。即使CPI转正了,在以上诸多因素的共同制约下,涨幅必将十分有限。而央行控制通胀的手段和能力,也是足够的。对于通缩持续一年有余,目前还处通缩之中的中国经济来说,通胀仅仅是芥蘚之疾,何况适度的通胀,对于保持总需求的增加,还是十分必要的。

但是,中国经济企稳回升的基础,即强劲的内需还不具备,明年的增长,还得遵循投资拉动的路径。因此,明年将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保持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当然在具体执行上,将有适度微调和弹性空间,而这仅是"技术问题",而非"大政",这就回应了各方对于明年政策是否变动的疑虑,给国人吃了一颗定心丸。

如果说,通过刺激性政策保经济增长是短期任务,不得不如此的话,那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特别是把内需作为经济增长拉动力量,则是经济的长治久安之计。这不但是发达国家过去的经验之谈,也是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上下获得的最大共识。

内需的核心是居民的消费需求,而非企业、更非政府的投资。所以,扩大内需,就是增加居民的消费信心和消费能力。消费信心和消费能力的增加,靠的是居民收入的可持续性增加,这除了需要经济的增长,更需要有重大的制度变革。

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人群消费能力",切中要害。最近几年,国民收入过度向非居民倾斜了。

先是农村居民。农民是中国最大的人群,但消费能力最低。这既有经济发展滞后的原因,更有制度性的约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最大亮点之一,是提出"要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这对几千万已在中小城市经商、实际居住多年的农民工的福利,对于他们的子女,享有与城市居民子女同样的教育、医疗等基本服务来说,是重大的利好消息。非但是重大的公平举措,也是让公共财政的阳光照亮全社会每个角落的实际行动,为解决这部分本来的农村居民的后顾之忧,增加他们的消费和投资,开辟了道路。同时,这也为更多的农民进城,扫清了制度瓶颈。"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传统思路是把农民继续留在农村,而允许农民进城,消弭他们的农民身份,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更根本的途径。有人担心,农民进了城,没有工作怎么办?其实,这是误会。因为城市化本身,就是一个大量增加工作岗位的过程,城市和农村的最大差别,就是城里的工作机会更多。

其次,是城市居民。城市居民有所谓"新三座大山"的压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在医疗和教育领域的投入。此前,国务院关于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公平医疗服务的思路,而教育部也表示将就基础教育的公平性做出决定。

住房,是城市低收入居民的"心腹大患"。中国社科院最近的一份报告说,85%的城市家庭买不起房。人们希望房价回归正常,可是房价是开发商、众多央企、地方政府、银行以及热钱等各方利益均衡的结果,也与现行财政体制有关,单是那剩余的15%的富裕家庭,就有足够的能力把房价拉高。但是,解决住房难题,非"一朝一夕"之功。何况房价的高低,也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作为决策最重大问题的经济工作会议,不可能就存在争议的房价本身给出说法。但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政府在其中的任务,也就是"加强廉租住房等保障性住房建设,支持棚户区改造。"这说明,让"居者有其屋",同样是政府的责任和愿望,而且政府一直在行动。

在经济处于并不稳定的时期,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复杂局面下,将改善民生作为明年工作的核心环节,是把经济的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统筹考虑的结果。这让我们对明年以及未来的中国经济前景充满信心。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融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夯实地方财政实力 "城镇化"才有着落

⊙马红漫

在全球发展低碳经济来控制气候变暖的大环境下,我国传统的工业化发展模式正面临着空前压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发展城镇化,是对既有工业化、特别是重工业化发展取向的扬弃,符合当前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指向。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极有可能意味着,城镇化将接替工业化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和核心战略。笔者认为,要想实现这一体制转型的顺利推进,城镇化的构想要从纸面走向现实,尚需全面优化财政体制的运行模式。而目前的核心问题在于,先得缓解地方财政资金困境,进而使之成为助推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的主角。

我国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化模式,在过去数十年里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从长远看,这种能源利用率低、生态污染严重为代价的经济增长,代价是高昂的,并不利于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哥本哈根气候峰会,让全球的目光聚焦于气候、环境问题,我国政府也以大国的姿态主动提出"将在2020年前碳减排40%至45%"。传统工业化发展模式因此必然要逐步淡出历史舞台。而工业化急需被取代的另一个现实原因则是,大规模工业生产在为社会提供丰富物质供给的同时,却面临着消费无力承接的尴尬。经历了金融危机的洗礼,美国国内的储蓄率由-2%一跃达到7%,信用消费需求大减。原有"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国际分工模式已难以为继。另一方面,消费滞后一直是困扰经济有效增长的短板。一个普遍的现象是,进城打工的农民将大笔劳动收入源源不断地汇到农村老家,而并不在当地消费,工业化创造的供给难以在国内得到消化。

中央此次强调城镇化发展,将有望适时解决目前产能过剩的问题。在国内,城镇户口并不只是身份标签,更重要的是其背后教育、医疗、养老等一系列福利的享有权。一旦放开中小城镇户籍,大量进城打工农民的家庭将可以全面融入城市生活,当地教育、医疗、商贸、餐饮、金融等方面的需求随之激增,进而有效地消化前期工业化模式下的供给沉淀。届时,消费将会接过投资的"接力棒",成为刺激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很显然,中小城镇财政资金的大规模增量投入,是这一目标得以实现的先决条件。遗憾的是,目前多数地方基层政府财政吃紧。这在中央政府为应对金融危机而实施的4万亿投资计划过程中已暴露得非常明显:许多投资项目却因地方政府财力所限无法正常开工。由此,面对城镇化过程中激增的公共服务需求,许多中小城镇的财政实力都将显得力不从心。一个典型的案例是,河南郑州曾在2003年全面放开户籍制度,不仅投资置业、买房、直系亲属投靠等条件可以入户,就连投亲靠友都可以入户,当地财政的压力骤然提高,而尤以在教育投入上的矛盾最为突出。2001年11月至2005年4月,在郑州市转户的38万多人中,18岁以下的青少年及学龄前儿童就达10万多人。一时间,当地中小学班级爆满,部分学校操场甚至站不下全体学生。而入城农民也发觉,中小城镇不仅缺乏稳定的就业和发展机会,而且能够为居民提供的公共服务也非常有限,城镇户口的吸引力大打折扣。最终,该地敞开的户籍大门悄然关闭。

导致地方财政捉襟见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下财税分权体制存在结构上的问题。从全国总体来看,地方政府享有财权30%,而其承担的各项事务则占70%。"钱少事多"的困境倒逼地方政府高度依赖预算外收入,"卖地生财"也因此而来。所以,在城镇化发展思路大规模付诸实施之前,当先行夯实地方政府财政资金实力。以笔者之见,可以从两方面着手:其一是改革税收分配结构,财政分配体制要设法平衡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其二则是完善地方政府的财力来源,实现财权与事权的对等。前者在短期内实现体制性变革的概率不大,但是笔者认为,为切实推进城镇化步伐,扩大中央财政到基层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似乎应提上议事日程。此外,伴随着前期地方政府债融资模式的开闸,让人们看到了财政融资体制改革推进的曙光,这也有可能促使基层地方财政为推进城镇化提供金融市场支持。只是,地方债市场普遍遭冷遇,说明此类金融产品制度设计仍有待结合实际继续深入推进。

(作者系上海第一财经频道主持人;经济学博士)

"净水机"每天糟蹋万吨水

随着城市居民对饮用水健康愈发关注,"水家电"销路越来越旺。但无论是小区自动售水机,还是被消费者高价请回家的"纯水机",多数都不配备循环利用的硬件,所以浪费惊人。在北京,每天至少有3万吨未经循环利用的水白白流入下水道。 漫画 刘道伟

QDII二度出海:这回能真正有斩获吗?

⊙姜 山

继易方达在本周一正式公开发售易方达亚洲精选QDII后,汇添富的亚洲澳洲成熟市场优势精选基金也将于近期公开募集。在蛰伏了15个月之后,公募基金的QDII产品又迎来了第二次集体出海的投资热潮。

在2008年业绩惨淡的QDII在2009年重获新生,海外市场自今年3月以来的良好表现以及全球经济逐渐复苏的大背景,帮助QDII基金业绩大幅攀升。据统计,截至12月4日,今年以来海富通中国海外股票基金的净值增长率达到89.56%,总计9只QDII中目前已有3只基金净值回归于面值之上,而国内火爆的新基金发行状况也为QDII的发售前景涂上了一抹亮色。

尽管基金业对二度出海充满热情,但首批QDII基金经历的惨痛教训,却也值得后来者好好吸取。QDII基金产品在2007年秋天推出之时,曾经深受市场热捧,多数产品均是大幅超出预计募资上限,不得不采取比例配售制度。然而,猝不及防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股市大幅下跌,将QDII投资者兜头一盆冰水浇透,部分产品一度净值打了三折,相关基金公司的声誉严重受损。

虽然有人将首批QDII产品的失败归咎于全球金融市场动荡的大环境,然而基金公司自身在海外基金产品上是否具备足够的研发能力,能否及时判断市场环境的变化,却是更令基金投资者关注的问题,也是QDII产品能否走向成功的关键。从首批QDII的表现看,尽管不少QDII基金经理具有可以说比较丰富的海外资本市场投资经历,也在以往取得过不错的成绩,但在2007年末时对国际市场的形势判断上,却出现了集体重大误判,不少基金在海外市场指数的近乎最高位置全力看多,采取高仓位的操作策略,在下跌初期也未能及时调整,最终导致净值大幅缩水。今年以来,随着国际市场的反转走高,QDII基金的净值均出现增长,但具体到各自的表现却是大相径庭,排名靠后的基金净值增长率仅有32.93%,大幅跑输市场。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国内国际市场联系日趋紧密的现在,中国的基金业者自然不能总是在国门之内打转,否则其未来的发展也是堪忧的。但如何吸取首批下海者的经验教训,使之成为二次出海者坚固自身装甲,抗御国际市场风浪的重要武器,则不能不值得基金业界认真思考。从易方达和汇添富所拟定的投资方向看,都选择在亚太新兴市场投资,这种选择的好处是,亚太市场的经济恢复速度较快,相关的公司也较为国内基金业者所熟悉,但缺点则是容易受到欧美市场的影响,一旦出现意外的危机情况,国际资金的大幅流出极易造成这一市场的剧烈波动,这在首批出海的QDII基金的过往表现中已经有所体现。二度扬帆的QDII基金是否能够做得更好,的确颇令投资者关注。

如果仅仅以拼年底排名,通过扩张基金规模收取高额管理费为目的,而不注重海外投资团队的培养和建设,在投资决策上无法及时跟随海外市场变化作出正确决断,越热情的投资者,越长的申购队伍,越高的申购金额,带来的恐怕不会是越能够帮助基金公司长远发展的动力,反而倒会成为悬在基金公司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我们热切期待着QDII基金的二次出海能够获得成功,因为这是中国基金业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我们也满心盼望着QDII的基金投资者能真正分享到海外市场的收益,而不是成为风波诡鹬的国际金融市场中大鳄口中的美食。而这种希望能否实现,还要期待二次出海的基金公司诸公们能够真正把投资者作为衣食父母,把他们的权益时时刻刻放在心头。如果说,上一次,我们已经交了不小的学费,那么这次,理该真正有所斩获。

(作者系东航金融注册金融分析师)

■专栏·主持 沈飞昊

中国制造业的空间

——兼议增长方式转变及资本投资重点

袁东

一种思维或行为习惯以及习俗的形成,非一日之事;要改变,更非易事。所以,制度经济学家要将习惯和习俗作为社会经济系统辨识与变迁的基本解释因素。如果一种制度不能得到习惯和习俗的认可,很难得到有效实施。而制度变革的成功,一种新制度的有效施行,也就意味着作为其基本支撑因素的习惯和习俗悄然发生了变化。

一种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必然是以一定的制度框架作为保障的,所以,调整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总是艰难而有代价的。社会各方对此不能不抱有宽容的心态。

尽管学者们始终都在抱怨中国经济结构问题,但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骄人业绩的取得,结构改进却是一个主要引擎。特别是过去30年来,先是在传统农业改造过程中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改进,接着是制造业高速增长带来的城市经济结构的改善,还有如今服务业在城市化加速进程中的增长,无一不是不同阶段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目前,以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占了GDP的近一半,服务业占了40%左右,这已与30年前中国经济结构有着天壤之别。当然,在这次全球性金融与经济危机中,中国又一次面临着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的突出问题。这并非坏事,否则,就意味着增长空间的缺失。

无疑,工业化、城市化和服务业的推进,仍是今后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现代史的经验表明,没有工业化,就没有城市化和服务业的快速推进,工业化仍是重中之重,中国增长方式转变的重点因而也就仍在制造业。这不仅因为产业通过由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的转移,可以节省30%至40%的成本,从而使中国制造业仍将在相当长时期内维持全球竞争优势,更因为在长期粗放增长奠定的基础上,中国制造业的两端存在着巨大扩张空间。

一端是研发,及由此延展的高精尖先进制造业。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中国的船舶、汽车、飞机制造业已居世界第一规模。但遗憾的是,这三个领域的核心设备,包括发动机、数字化信息集成系统、卫星导航系统等,基本是进口。这些核心设备的价值,占到整机成品总体价值的大部分,由此,目前中国在这三个领域所做的,不过是组装和外壳制造而已。世界第一产能大国,实则外国先进者的最大打工者。

核心技术与设备的研发制造能力,是下一步中国必须着力提升的,这将决定中国制造业向全球产业链高端进军的成败。可以预期,中国制造业仍有相当的整体提升潜力,在全球制造业中的竞争能力仍会得以提高。

另一端是制造业延续的市场环节,包括市场交易、营销、物流和相关服务。中国已是船舶制造规模最大的国家,但围绕新旧船舶和航运交易的市场,基本在欧洲航运强国;特种船舶的主要拥有者,基本是包括船舶基金在内的西方各类船东,中国这个最大的承租者,却掌控不了世界船舶租赁市场。2009年,中国已成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但作为制造业成品的整车运输市场,却基本被欧洲、日本和韩国所垄断,中国尚未建成一支成规模的汽车滚装船队。

这些针对制造业产成品的交易市场,形成了定价中心和营销网络,促成了庞大的物流行业。前者掌握着全球定价功能,利用价格杠杆不仅将供求关系向着有利于掌控者的利益方向变动,更是将尽可能多的利润转移到境外,而将成本和损失留在中国,也以此逃避中国税收。另外,通过行业景气上升时提前下订单、景气下落时终止订单的方式,原材料涨价和产成品价格下滑的风险几乎全部留给了中国制造商。后者,由于体积、安全等因素,某些制造业产成品流转所需要的特种运输、存储、服务市场因被他人掌控,中国制造商遂成物流等服务价格的被动接受者,这在给境外垄断者带来丰厚利润的同时,进一步挤压了中国制造业的利润,也扭曲了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模式。

如果能够改变这种研发、物流两头遭挤压的状况,不仅中国制造业的价值含量将大大提高,能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的可持续增长,还能够切实推动作为现代服务业主体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没有诸如研发设计、营销和市场交易、物流、管理咨询、金融保险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断然不会有现代服务业的整体发展。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恰好是后工业社会的主要增长力量。所以,推动中国制造业向两端发展,理应成为今后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

已经有强烈的迹象表明,国家整体发展战略重点越来越清晰地体现出以上要求。可以预见的是,研发设计、高精端先进设备制造业,以及市场交易、全球性营销网络和物流环节的建设与发展,在今后会加速。而这两大领域,正是各类资本的投资重点。由此也可以肯定,无论是私人股权资本还是银行信贷资本,也不管是大额资本还是小额资本,对这两个领域的投资,都会是今后一段时期内获利最为丰厚的投资。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教授)

企业家们为什么如此不安

王育琨

当代人恐惧太多了:恐惧失业、恐惧危险、恐惧破产、恐惧匮乏、恐惧被骗、恐惧没人爱、恐惧孤独、恐惧不成功、恐惧孩子不成材,等等。当人有了某种需求,而还没有满足这种需求的手段和技能时,恐惧就产生了。太想成为什么,太想拥有什么,太想保住什么,而现实又有许多不确定性和困难,人就不可能排除恐惧。

从心理学的角度讲,恐惧是一种有机体企图摆脱、逃避某种情景而又无能为力的情绪体验。必要的恐惧和敬畏,能使人处于被动的警醒状态,是一个人生存很必要的东西。叔本华就断言,人生像钟摆,就在无聊和痛苦之间晃荡。当欲望满足了,人生就无聊;当欲望没法实现又处在深深的恐惧和痛苦之中。从这样的意义上说,恐惧又成了人们发奋努力的一种必备状态。

然而,当恐惧由生理和意识上的恐惧进一步传导而形成内心深处的恐惧时,恐惧就会成为一个人行为或者生活的主宰力量,就会使一个人的认知和判断出现很大偏差。深深的恐惧摧毁着我们的心,使我们的心也丑恶起来。

成功企业家总有多种荣誉的光环加身,这让他们有了一览众山小的豪迈,同时也落下了置身于人群中的孤独与落寞。在公众眼里无所不能的企业家,内心深处却生成了令人窒息的紧张与焦虑。因为对人性的恶有着百倍的恐惧,他们寝食难安。"制度就是对人的不信任",是多数企业家们喜欢时常挂在嘴边的箴言。在职业生涯中一直信奉"不用聪明人"的提义明,可以说是一直被"恐惧"所奴役,并且最终被击败的日本前首富。

一直谨记中国荀子"性本恶"之告诫,严承父亲"不交朋友"之遗训的提义明,接掌西武集团40年,把西武集团发展成一个经营铁道、连锁饭店、百货商场、消闲设施,购买了日本六分之一土地,拥有了一流职业棒球团队的企业王国。他孤独决断,历经惊涛骇浪,躲过层层劫难,甚至那场席卷东南亚的金融危机也未伤到他。可是2005年3月,提义明却因高管举报其虚报母公司持股比例而被捕入狱。

没人了解真实的提义明这个商人中的哲人。他把人性恶作为管理公司的基点,对任何人都处于深深的猜疑之中,终于培养起了不忠诚的团队。一生用尽心机提防着阴谋,最后却偏偏在习以为常、自作聪明的套路中折戟。

商业只有在关系中开拓道路。可正是如空气和水一样不可或缺的关系,却成了企业家们恐惧的根源。一如孤独无援的提义明,企业家不会像常人那样可以随意向人诉说苦闷,从而得以化解掉一层层危险。企业家面对任何苦闷和无奈时,没有倾诉对象,甚至仿佛上帝也不与他们同在,所有的难题只能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化解。久而久之,一种巨大的不安全感袭来,形成他们怀疑一切人的心理机制。

恐惧不会被免除或抗拒。了解恐惧的整个本质和结构,才能在心理上终止恐惧。只有当一个人的心是新鲜的、新颖的,了解恐惧和学习恐惧,才有可能。这是我们的困难所在。因为我们总是用联想、记忆、经验、意外来面对恐惧。

我们时常被那些已有的经验和套路所左右,面对真实的存在还没有开始发挥作用,就已被判决了。判决那些我们不会判决的东西,对我们来说像呼吸那么自然。或许是迈过一道道沟坎,度过一个个危机,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企业家开始学习与恐惧共生,开始从事多样化的心性修炼。为提升自己的心性,克服恐惧,有些企业家学佛修道,有些人至信基督,有些人研修太极、大成拳以及多种气功,有些人则扎扎实实把大事做小、把细节做透。无论通过什么方式,只要能专注做好一件件小事,心就定下来了,心定,则智慧就跟着升起来。这时,恐惧便不会兴风作浪,因为恐惧已被当成了自然的律动或节奏,融入企业家的生活中了。

自知是没有终点的。这是一条无尽的河流,能发现和体验"一种内心富有创造性的空",人就会找到安宁。此时,没有方向,没有框框,没有成见,没有执著,也就没有过去的经验和知识左右他的行为,他就不是过去的奴隶,他是当下的主人。对中国的企业家来说,2010年,或许正需要通过这种超越时间的洞见,促成一种深刻的变化。 **(作者系清华大学长三角研究院中国企业家思想研究中心主任)**